



唐

天宝文学 编年史

熊笃编著

重庆出版社

天宝文学编年史

熊 笃 编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 卢季野

封面设计： 郝大鹏

熊 笃 编 著
天 宝 文 学 编 年 史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插页：2 字数：150千
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4,000

*

ISBN 7-5366-0355-X

I · 66

书号：10114·267 定价：1.15元

序

刘 知 渐

我曾在拙著《建安文学编年史》的序文中，谈到文学编年史有助于文学史的“更新”，有助于总结文学发展规律。我曾希望有志于此的文学史工作者，都来写几段文学编年史。由于这个工作比较吃力，响应的人不多。现在看到熊笃同志的《天宝文学编年史》，十分高兴，特写下自己的一点感想，作为此书的序文。

从天宝文学的“编年”看来，盛唐文学发展的高峰在后期而不在前期。前期大体在开元年间（712—741）。由于唐玄宗消灭了武后和韦后的残余势力，比较能够“励精图治”，国民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正如杜甫后来的《忆昔》诗中所描写的：

忆昔开元全盛日
小邑犹藏万家室
稻米流脂粟米白
公私仓廩俱丰实

九州道路无豺虎
远行不劳吉日出
齐纨鲁缟车班班
男耕女桑不相失
宫中圣人奏云门
天下朋友皆胶漆
百余年间未灾变
叔孙礼乐萧何律

.....

开元不仅是唐王朝的极盛时代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。但是，唐玄宗不善于“持盈保泰”，一方面骄奢淫逸，信任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等人，以致“言路壅塞”，朝政败坏；另一方面又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大大损害了兵力和民力。在天宝初年即已呈现衰象，到天宝末年，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，安禄山一作乱，唐玄宗就连老婆都保不住而逃奔成都，盛唐的历史也就从此盛极而衰了。

盛唐文学，可以说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见证。它的上限，可以始于开元，下限可以算到唐代宗大历五年(770)，恰好是杜甫生存的年代。在将近六十年的盛唐文学中，后期的天宝文学比前期的开元文学多些好些，成为盛唐文学的高峰。一般的“盛唐气象论”，偏重前期，似乎盛唐文学只能是经济之“盛”的反映，这是不全面的。

马克思曾经谈到过“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例如艺术生产的发展之不平衡”^①。我们认为，盛唐“文化”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产物，但盛唐“文学”和经济的繁荣是不平衡的。当

唐代经济在开元年间达到高峰时，文学上歌功颂德的东西多于揭露现实的东西，不算高峰；高峰是在盛极而衰的天宝年间才出现的。原因是作家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揭露现实上，才出现了高峰。

例如批判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是盛唐边塞诗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而这类诗在开元年间还较少，在天宝年间才多一些。本来，唐代边患一向很多，唐王朝一再反击，这对于巩固疆土，保护人民，曾经是必要的。但这种战争，应当适可而止。远在开元十三年(725)冬末，中书令张说就曾向唐玄宗奏称：“吐蕃丑逆，诚负万诛，然又事征讨，实为劳弊。且十数年甘、凉、河、鄯征发不息，纵令屡胜，亦不能补。闻其悔过请和，惟陛下遣使许其稽颡内属，以息边境，则苍生幸甚。”^②但武臣都希望打仗，以便从中取利，而唐玄宗又有好大喜功的心理，以致战争连年不息，到了天宝年间，问题就更加严重。一些从军的诗人希望建功立业，偶然歌颂战争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眼光敏锐的诗人，往往能够在常人歌颂战争的时候便提出批判。如李白的《战城南》中写道：

去年战桑干源

今年战葱河道

洗兵条支海上秋

放马天山雪中草

万里长征战

三军尽衰老

.....

烽火燃不息

征战无已时

野战格斗死

败马号鸣向天悲

鸟鸢啄人肠

衔飞上挂枯树枝

士卒涂草莽

将军空尔为

乃知兵者是凶器

圣人不得已而用之

可见诗人在天宝六年左右，已经发觉到唐玄宗好大喜功、穷兵黩武的问题而加以批判了。诗中的“去年战桑干源，今年战葱河道”，系指天宝元年(742)唐将王忠嗣北伐奚、契丹，皆战于桑干河，及天宝六年(747)唐将高仙芝率兵六万，自安西拔换城经疏勒、登葱岭、涉播密川、登特勒满川攻击吐蕃的“二战事而言”^⑤，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。李白在《古风》第十四首中，还有“赫怒我圣皇，劳师事桴鼓。阳和变杀气，发卒骚中土。三十六万人，哀哀泪如雨”。更是对唐玄宗好大喜功的总批判了。

他如李颀的《古从军行》，可能写于天宝之前，也是批判唐玄宗好大喜功的好作品。他写道：

白日登山望烽火

黄昏饮马傍交河

行人刁斗风沙暗
公主琵琶幽怨多
野营万里无城郭
雨雪纷纷连大漠
胡雁哀鸣夜夜飞
胡儿眼泪双双落
闻道玉门犹被遮
应将性命逐轻车
年年战骨埋荒外
空见葡萄入汉家

李颀卒于天宝十年(751),他批判了穷兵黩武,说汉武帝打仗,只不过赢得了西域的葡萄种子,其它并无所获。暗示唐玄宗的好大喜功,对国家人民并无好处,不仅伤害了汉兵,而且伤害了“胡儿”。诗人的胸怀里没有一点大汉族主义情调,这更值得珍视。

再如杜甫的《前出塞》,也写于天宝初年,其中如“君已富土境,开边一何多”(第一首);“杀人亦有限,立国自有疆;苟能制侵陵,岂在多杀伤”(第七首),都是对唐玄宗的批判。而他的《兵车行》中还写了下列事实:

或从十五北防河
便至四十西营田
去时里正与裹头
归来头白还戍边
边庭流血成海水
武皇开边意未已

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

千村万落生荆杞

纵有健妇把锄犁

禾生陇亩无东西

况复秦兵耐苦战

被驱不异犬与鸡

长者虽有问

役夫敢申恨

且如今年冬

未休关西卒

县官急索租

租税从何出

.....

这就不仅是从同情人民的角度来批判唐玄宗，而且从客观上指出了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原因之一，在于好大喜功，穷兵黩武，使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。这首诗的编年，或以为天宝九年(750)，或以为天宝十年(751)，作品中的“或从十五北防河”，一般认为指开元十五年(727)防秋之役，下句“便至四十西营田”，就已二十五年了，编在天宝十年(751)，是大致可信的。但诗中内容也不一定专指一事，而是对天宝年间有关穷兵黩武诸战役的总批判。

此外，王之涣、高适、岑参、王维、王昌龄诸人的边塞诗，或写边塞风光，或同情出征将士的苦难，或歌颂从军战士的英勇，都各有特色，各自达到一定的成就。例如王之涣的《凉州词》、高适的《燕歌行》、岑参的《轮台歌》、《走马川

行》、《白雪歌》，王维的《老将行》，王昌龄的《从军行》、《出塞》诸作，都是一时的名篇。

二

批判皇室和上层集团骄奢淫逸，损耗国力，是天宝文学的第二个重要方面。每个王朝在“承平百年”之后，劳动人民用血汗养肥了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，他们总是会骄奢淫逸，挥霍无度的。李白在《古风》第四十六首中写道：

一百四十年

国容何赫然

隐隐五凤楼

峨峨横山川

王侯象星月

宾客如云烟

斗鸡金宫里

蹴鞠瑤台边

举动摇白日

指挥回青天

.....

此诗写作的具体时间尚有争论，但大体作于天宝初年，因为从唐高祖武德元年(618)算起，到唐玄宗天宝七年(748)，就已有一百三十一年了，使用一百四十年的虚数是可以容许的。李白此诗对皇室及王孙公子的骄贵气焰，是有所批判的。它如第八首的“咸阳二三月”，第二十四首的“大车扬飞尘”，内

容也大体相近，都是天宝初期的作品，有批判性。

大诗人杜甫这方面的作品也很不少。特别是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》这首长诗，写得非常沉痛而深刻。诗中指责了唐玄宗在骊山华清宫，对安禄山、杨国忠姊妹赐宴赐浴的极度骄奢。他写道：

凌晨过骊山

御榻在嵯峨

君臣留欢娱

乐动殷樛葛

赐浴皆长缨

与宴非短褐

彤庭所分帛

本自寒女出

鞭打其夫家

聚敛贡城阙

.....

况闻内金盘

尽在卫霍室

中堂舞神仙

烟雾蒙玉质

暖客貂鼠裘

悲管逐清瑟

劝客驼蹄羹

霜橙压香桔

朱门酒肉臭

路有冻死骨

荣枯咫尺异

惆怅难再述

.....

这是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冬天，诗人路过骊山时作的。当时，安禄山反叛的消息尚未传来，诗人用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十个字，概括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劳动人民的冻死饿死，成为千古绝唱。那些故意贬低杜甫的妄人，又将何以解此？

李白、杜甫以外的其它诗人，如岑参、元结、韦应物等，对同类问题也都有所反映。

奸佞专权，是唐王朝盛极而衰的因素之一。李白、元结、萧颖士等人，都曾在天宝年间讽刺和揭露过李林甫、杨国忠的专权误国。特别是杜甫的《丽人行》，从杨家兄妹春日出游长安城郊曲江风景区的气焰，写出杨国忠专权误国的信息。他写道：

三月三日天气新
长安水边多丽人

.....

就中云幕椒房亲
赐名大国虢与秦
紫驼之峰出翠釜
水晶之盘盛素鳞
犀箸厌飫久未下
鸾刀缕切空纷纶

黄门飞鞚不动尘

御厨络绎送八珍

箫鼓哀吟感鬼神

宾众杂沓实要津

……

炙手可热势绝伦

慎莫近前丞相嗔

通过一场郊宴的描写，刻画杨国忠兄妹气焰嚣张的神情，真是活灵活现。

在讽刺和揭露剥削阶级的同时，天宝诗人们也写了一些同情人民苦难的诗篇。如李白的《丁都护歌》，写船夫拖上水船的苦痛；《北上行》，写北方农民“尺布不掩体，皮肤剧枯桑”的穷困。高适的《东平路中遇大水》，哀叹“农夫无倚着”；《苦雨寄房四昆季》，感叹“田农”一年四季努力耕种，替国家提供赋税，而家中竟无“斗储”。还有元结的《悯荒诗》、《贫妇词》，储光羲的《效古二首》，都是同情人民的。大诗人杜甫的《秋雨叹》，有“城中斗米换衾裯”的描写；《九日寄岑参》，有“吁嗟呼苍生，稼穡不可救”的感叹。都是关心人民、同情人民之作。

三

盛唐文学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的成就，但一般的“盛唐气象论”，并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。通过天宝文学的“编年”，我们可以看出下列一些问题。

首先，盛唐文学不止是继承了三曹七子到陈子昂的传统，而且推陈出新地继承了南北朝文学的传统。陈子昂批判六朝文学是“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”^④，这当然是为了“矫枉”，值得重视，但如否认六朝文学在艺术方面的成就，这就未免“过正”，也是不恰当的。盛唐诗人以健康的内容为主，吸收了六朝文学的艺术技巧，特别是以“诗圣”杜甫为首的天宝文学，内容的丰富，形式的完美，风格的多样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
从内容看，天宝诗人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，比任何时代都丰富，不仅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没有达到这样水平，就是开元诗人也没有如此广阔。拿盛唐代表诗人杜甫来说吧，他在开元二十九年(741)时，年仅三十，作品不多，也不成熟。如他的《望岳》、《游龙门奉先寺》等，写于开元末年，和他的前辈陈子昂相比，在艺术水平上就还没有达到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的境地。李白比杜甫大九岁，开元年间作品不少，比杜甫多，但他在天宝年间的作品就更多更好。其他诗人，也大体类似，他们在开元年间也写边塞诗，但优秀作品多在天宝时期，尤其是批判现实的作品，基本上都在天宝时期。中国诗人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，是到唐天宝年间才达到完美境界的。

从体裁看，中国诗歌的体裁，先秦只有四言和骚体，汉末出现了五言和七言，但声律不够完美。自从沈约提倡声调，才给中国诗歌的音节美开辟了道路，当时还受到钟嵘等批评家的反对。其实，这是汉字诗的必由之路，虽然运用不熟，会感拘束，但问题还是在于用得好不好，不是该不该用。“五

四”以后仿效欧洲诗体的白话诗就很自由，没有拘束，但要写出好诗还是不容易的。唐代诗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了五七言近体诗，特别重视音节美，而五七言歌行也适当重视音节美，有时还写成兼用五七言的长歌，常有气势磅礴的感觉，五光十色，各尽其妙。而这些都是初唐启其端，天宝收其果，天宝文学在体裁的创造上也达到了高峰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。

从风格看，李白的浪漫主义，杜甫的现实主义，都是盛唐文学的高峰。一般常把浪漫主义风格说成“盛唐气象”，这是不大全面的。历代诗人有从“大处着眼”的，也有从“小处着手”的，前者近似浪漫主义，后者近似现实主义。若把“盛唐气象”理解为主要指前者，就不能完全概括盛唐文学的艺术成就了。因为这样一来，就不免导致“扬李抑杜”，说杜甫并不代表盛唐文学了。郭沫若同志的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，颇为读者所疵议，就因为他“扬李抑杜”，歪曲了历史人物。

究竟盛唐文学有没有近似“盛唐气象论”者所说的那种“气象”呢？回答是肯定的，但不能用它来概括盛唐文学。盛唐文学有从“大处着眼”而近似于浪漫主义的作品，也有从“小处着手”而近似于现实主义的作品。李白的浪漫主义多些，杜甫的现实主义多些，这既有时代的影响，也有个人气质的因素。开元年间，国力强盛，诗人们充满希望，容易产生浪漫主义；天宝末年，唐王朝盛极而衰，容易产生现实主义。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诗人自身的气质。

拿李白来说吧！他出身于跑西域、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家庭。

庭。他说自己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；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。虽长不七尺，而心雄万夫”^⑤。这当然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。他年轻时还学过道，有点相信“神仙之术”，贺知章称他为“谪仙人”，意即神仙谪降尘凡变成人的。杜甫赠李白诗，有“昔年有狂客，号尔谪仙人。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之句^⑥。可见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，是家庭禀赋和生活形成了他的气质，由气质决定了他的诗风。

如像《将进酒》这首诗，本来是因为仕途失意而借酒浇愁的。试看：

高堂明镜悲白发
朝为青丝暮成雪
人生得意须尽欢
莫使金樽空对月

这不有点颓废么？但他写得来气势磅礴，一开头就是：

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
奔流到海不复回

本来是消极的思想情绪，却被他写得来好像很豪迈。接着又写了劝酒喝酒的豪言壮语。先说：

天生我才必有用
千金散尽还复来
烹羊宰牛且为乐
会须一饮三百杯

这也很豪迈，但消极的思想情绪毕竟无法完全掩盖。接着就写道：

岑夫子

丹丘生
将进酒
君莫停
与君歌一曲
请君为我倾耳听
钟鼓饔玉不足贵
但愿长醉不愿醒
古来圣贤皆寂寞
惟有饮者留其名

消极颓废的苦闷情绪就又上来了，以浪漫主义的豪言壮语来倾吐精神上的苦闷，这就是生活和气质决定的。一个曾经“遍干诸侯”，“历抵卿相”的人，哪儿真会感到“钟鼓饔玉不足贵”呢？不过是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”的变态心理而已。但李白终究是个富于家财、挥金如土的人，按照“居移气、养移体”的原则，他的自负不凡是来自豪富家庭的，即使写点发泄苦闷的东西，表面上也不是抑郁低沉的。

再以《早发白帝城》为例，这首诗是李白流放夜郎，在夔州遇赦，返回南方时写的。他写道：

朝辞白帝彩云间
千里江陵一日还
两岸猿声啼不住
轻舟已过万重山

大家都熟悉这首诗，他决不是《水经注》中三峡一段的隐括而是惊喜之余，顺口说出来的。后数百年的黄庭坚，也因贬谪多年，遇赦还乡，路过洞庭湖，在岳阳楼上写了《望君山》